



以最强有力的意志去肯定生命

——杨立华教授在复旦人文智慧课堂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哲学、魏晋哲学等，出版专著《一本与生》《中国哲学十五讲》《宋明理学十五讲》、译著《宋代思想史论》等。

哲学对我们是必需的吗？

一个人如果一辈子能免于被哲学打扰，其实也挺幸福。因为一辈子不用思考，就可以永远生活在最饱满的直接性当中：把炉火生得通红，每天挥汗如雨，也挺好的。

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样的情况好像不太可行了。技术条件的改变，使得闲暇成为普遍。当人们得以从具体事物的束缚之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当生活和世界以整体的面相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生成为疑问。这一刻，哲学就降临了。

“成为疑问”并不是一件坏事。哲学的起点是肯定性的，就源于人生成为疑问。当世界否定了，哲学就诞生了。所以，我不能不感慨地说，今天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时刻。某一瞬间你开始意识到人生是一个问题，然后你就开始思考。这种思考往往就具有哲学意义。

我常常开玩笑地说，哲学这病只要染上，终身无法痊愈。但是，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否定性阶段。很多学者讲了一辈子，最后讲出一个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还用哲学吗？不需要。艰难地活着，才需要哲学；以最强有力的意志去肯定生命，这才需要哲学。

简而言之，哲学虽然起点是否定性的，但一定要达到肯定性的阶段。在肯定性的阶段里，在更高的层面使哲学成为肯定生命的力量，而不是否定生命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跟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也就凸显了出来。

本版稿件选自上观新闻“思想汇”栏目
栏目主编王珍邮箱：shhgcsxh@163.com

每一次大的哲学突破，都源于时代价值危机深化

每一个时代都会不断地出现。原因很简单，当你面对世界本身的时候，当你开始用疑问的方式来探索世界、思考世界的时候，就会有一脚踏空的感觉。因为，原本实实在在的东西，瞬间就可以看到其背后空虚的性质，进而开始产生怀疑——“我们活着干什么？”

虚无主义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只不过不同时代的虚无主义程度不一样。值得庆幸的是，对今天的人来说，所有伟大哲学家都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今天阅读任何一个伟大哲学家的哲学思考，都有其当代性。由于哲学问题的普遍性，也就

意味着哲学家的思考具有普遍性。哲学家思考的普遍性，决定了伟大哲学家可以与任何同时代的人对话。

虚无主义问题的深化，在我们身边有着各种各样的呈现。例如，有时候我们看老照片、老镜头，会发现那时候中国人的脸普遍都长得挺好看的。即便五官并不出色的人，看上去也挺好看。但是今天，如果不修图，很多长得好看的人拍出来也似乎不怎么好看。

这是为什么？在我看来，因为缺少某种凝聚的精神，所以五官有些模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

精神面相的一个体现。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面临更多的诱惑和挑战，不确定性增强，内心的成长有时候跟不上物质的增长。

因此，我们需要去看每一个时代哲学家在努力干什么，最直接地在解决什么问题。每一次大的哲学突破，一定是源于时代的价值危机深化。价值危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哲学就需要取得一种突破。当这种突破足以解决时代价值问题的时候，这个时代的哲学任务就得以完成。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也可以用于时代价值危机的深化过程来予以概括和总结。

中国哲学关注“此世”，因而表达简洁目光“单纯”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产生如此伟大的哲学思考？有人认为是因为当时是乱世。可我们常常说乱世出英雄，但乱世不见得会出哲学家。比如五代，够乱吧，但真没出什么哲学家。

哲学取得真正突破的时代，一定是社会矛盾激化尖锐的时代，一定是价值危机深重的时代。只有在这样的时代，世界本身的问题才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哲学家的生活之中。

春秋末年的价值危机体现为什么呢？透过历史的记载，包括《论语》的一些表述，我们可以得出初步印象，那就是“礼坏乐崩”。如果用价值方

面的问题来讲，就是在那个时代“价值确信”被动摇了。

“价值确信”背后是理性，是道理。中国文明有突出的“此世”性格。一个文明如果围绕“彼岸”展开，“此世”就要被克服和超越，“彼岸”才是目标。而我们这个文明围绕“此世”展开，就意味着“此世”是唯一的、唯一的过程。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文明非常关键。

中国哲学表达总是那么简洁，没那么多论证，也好像不如西方哲学那么严密。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哲学看待世界的目光。由

于它是根本的“此世”性格的文明，所以看待世界的目光里极少假设的概念，从而能以单纯的方式来审视世界、人生。这是中国文明和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

回到“价值确信”，孔子所处的时代“价值确信”动摇了。面对这一局面，孔子用他的思考，为这个时代重新树立或者说巩固了价值基础。

可以说，哲学是每个时代最庄严的守护，哲学守护在价值的根基处。当时代的基本价值被动摇的时候，哲学就要起来捍卫；当价值根基被拔除的时候，哲学就要重新为时代确立价值基础。

每一个哲学传统、每一代哲学家都在努力“回归”

有种错误印象以为，中国哲学不发展，而西方哲学发展了。其实，西方哲学家也都是在“回归”。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期”概念，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步前行都要在“轴心期”获得重新起步的动力、获得滋养。某种意义上，德国古典哲学就是向古希腊哲学的回归，接续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

但是，哲学的“回归”不是简单回到过去。为什么越晚近出来的哲学越难读？《理想国》再难，总不会一页纸都看不懂吧？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真有可能一页纸都读不懂。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体系化的程度和论证的严谨程度在提高。由于时代价值危机不断深化，

导致哲学必须提供更有力量的辩护。只有严谨的论证，才能为你所辩护的价值提供足够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既不发展，又在发展。

回到孟子的时代，当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然而，战国时期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把“百家争鸣”视为麻烦。因为“百家争鸣”意味着错误思想横行，其背后不再是价值基础被动摇这件事，而是价值基础的缺失。

价值问题回答的是“应该”，而价值基础缺失以后，对“应该”这个问题的回答，如社会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美好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所有这些根本问题都产生了不同意见。

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三个时代魏晋时代，这个时代价值危机进一步深化。整个魏晋时代的价值危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怎么活，有区别吗？”最著名的是《列子》的话：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也，孰知其异！既然终有一死，那活得多么崇高，又怎样？活得多么猥琐，又怎样？

在这样一个价值危机深化的时代，魏晋玄学出现了。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一个大飞跃，出现了王弼、郭象这样的伟大哲学家。他们用哲学思考，重新建立起了正确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追求；它不是指向虚无，而是指向虚无的克服。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就会留下什么样的世界

刻按题目把自己所想的写下来，之后就上面改。他说：“改得一字便进得一字。”因此，读张载的《正蒙》，真是一个字都不能轻易放过。

张载哲学在最根本的本体论层面或者宇宙论层面上，最重要的就是证明三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易传》中就有，只是没有直接呈现出来。张载则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第一，破除虚无。虚无是假的，虚无不是真正的虚无。你看着是虚无的，其实也是气的某种形态。太虚是气的最原初形态，虚、无、空都是概念的误用。

第二，世界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既然没有

开端，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是无限的。什么叫无限？无限就是无法完成和最终确定的。既然世界没有开端，也就意味着我们之前其实就有无限时间，也就意味着世界是无限的。由此，不仅世界是实有的，而且世界是永远实有的。

第三，生生不已，意味着变化永恒。在这里，张载用“一物两体”的观念来证明。只有相互作用的双方互为条件，它们的相互作用才是必然的，如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没有积极，也就谈不上消极。

什么样的对立才互为条件？比如，你看到一张白纸，如果这个世界全都是一片白，你看到什

么？什么都看不到。没有分别的东西，感官不能把握，是不可能进入经验的。所以，“一”是形而上者，分别状态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不朽对一个人来说变得真实了？由于世界是无始无终的，你不管做过什么，你的影响会无限延伸下去，你的作用会凝结在后来世界的作用和发展当中，这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朽吗？从儒家的道理来看，人生的意义就应该这样来理解：活着的时候努力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死了以后就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整理人：王珍）

解新日报 消费市场 专版

刊登内容

-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021-22898552

失去了亲爱的父亲



樊锦诗自述

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 口述 顾春芳 撰写

那天打完青霉素，就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开始感到浑身发冷，到了宿舍已冷得浑身发抖，我把两床棉被都盖在了身上，还是感到非常冷。不一会儿，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大约已经是晚上10点，只见屋里很黑。我不能确定自己在哪里。我甚至有一种幻觉：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坟墓里？为什么这么黑！我一摸自己身上，慢慢意识到自己打过针，是打针之后开始发冷。于是又摸摸自己，确定自己没有死。

再看外面，有一星光，那是旁边房子里煤油灯的光，昏暗的光照射到了我黑压压的屋子的窗户上。我突然想起来，我屋子旁边住的是一个司机师傅。于是我就使劲爬起来，去敲这个师傅的门，边敲边说：“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杨大夫给请过来？”这位师傅就把下午给我打针的医生请来了。杨大夫看到我的样子，吓得大声说：“这是青霉素过敏，非常可怕！弄不好，就醒不过来了。”那天晚上，杨大夫不放心，把我安置到医务室观察了一夜。

还有一次我感冒了，以为到医务室输液就会好。结果注射了清开灵后不久，我的嘴唇肿起来了，喉咙也难受，原来又是药物过敏了。当时也很危险，嘴都发白了，脸上没有血色，负责输液的那位护士吓得不轻，赶紧拔了针头，做了脱敏、防休克处理，我的嘴唇慢慢开始有了血色。因为我当天还要出差去北

京，恢复过来以后，就直奔机场了。在敦煌的日子里，每每有点不舒服，我就在医务室开点药吃一下。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不过我也感到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还应该多关心其他工作人员的健康。现在医疗条件比以前好了，我也每年都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

我父亲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对工作非常投入，下班回家后不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就是看书。我觉得自己身上也有这股子认真劲儿，可能是受当时社会的影响，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留在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画面，就是手上不离三角板、曲线板、丁字尺、计算尺，弯着腰绘制图纸的样子。

父亲是学土木工程的，也喜欢艺术，爱看书，知识面很广。记得我们有一次从父亲的书架上翻出一套书，非常精致，打开一看都是英文，根本看不懂，因为我们当时学的是俄语。父亲看见了就告诉我们，这是英国莎士比亚写的戏剧，里面有很多哲理。还说将来我们一定要学好英语，这样就可以看很多英文书籍。他还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先找中文的莎剧译本来读，父亲最喜欢的是朱生豪的译本。此外，他还

喜欢林语堂，家中有不少林语堂的书，还有不少古书。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要么看英文书，要么看古文书。小时候他教我们学古文，让我背诵《古文观止》里的文章，如《桃花源记》等。父亲曾对我说：“中国人，一定要学好古文，文章要写得好，必须要学好文言文。”我小时候在他的影响下，练书法，听评弹，看中外经典。我的兄弟姐妹们也非常热爱艺术，家里还让小弟弟学了钢琴。大概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喜欢看书。有一次，我读到北京大学叶朗教授的《文章选读》，里面选了很多好文章。我看这本书时，就想起了父亲，想起他们让我们背那些文言名篇。

我的父亲为人低调谨慎，但厄运还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了。记得是1968年初，有一天，我收到弟弟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故。这事发生得太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在搞运动，所以我急忙忙忙向组织请假之后就买了火车票回上海。

一路上我暗自思忖，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从来也没听说他有什么病，怎么会突然就病故了。父亲这样的年龄，一般猝

死的话，不是心脏病就是高血压，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父亲有这方面的毛病。越想越觉得蹊跷，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有了呢？在火车上，我几天没有合眼。

火车停靠上海站，我的两个弟弟来接我。我一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父亲不是病故，而是非正常死亡。

两个弟弟一路上沉默不语，没说父亲的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是病故，他们肯定会把病情告诉我的。我越发感到父亲死得蹊跷。到家以后我看到一个文件，那是单位开的死亡证明，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刺目的两个字：“此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把他关押在单位的一个房间里，不让他回家，接连批斗，还轮番审讯。父亲因为不堪忍受这种羞辱，就跳楼了。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父亲这样的人会被斗，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后来才知道斗他的理由是说他私自藏匿枪支，是“反动学术权威”。

父亲走的时候，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家也被抄了，全家人被赶出了原来住的房子，安置到另外一间房子。一家人就蜗居在那间房子里。“文革”期间，连我大弟结婚也都在这个房子里，只能把房子一分为二，大弟的那半边房连窗户都没有。他的就业也受到了影响，街道不给安排工作，最后只能去挖地道，每天回家都是一身土。最可怜的是小弟，父亲在世时最喜欢他，希望有朝一日把他培养成钢琴家。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的时候，学习成绩比较优秀，未来本可以报考音乐学院。父亲去世以后，他当钢琴家的梦也破碎了。“文革”以后，面面试的人听说他会弹钢琴，就让他随便弹一首曲子弹奏，不一定非要弹《红灯记》，西洋的曲子也行。这样他总算谋到了一个职业。

(十八)

连载